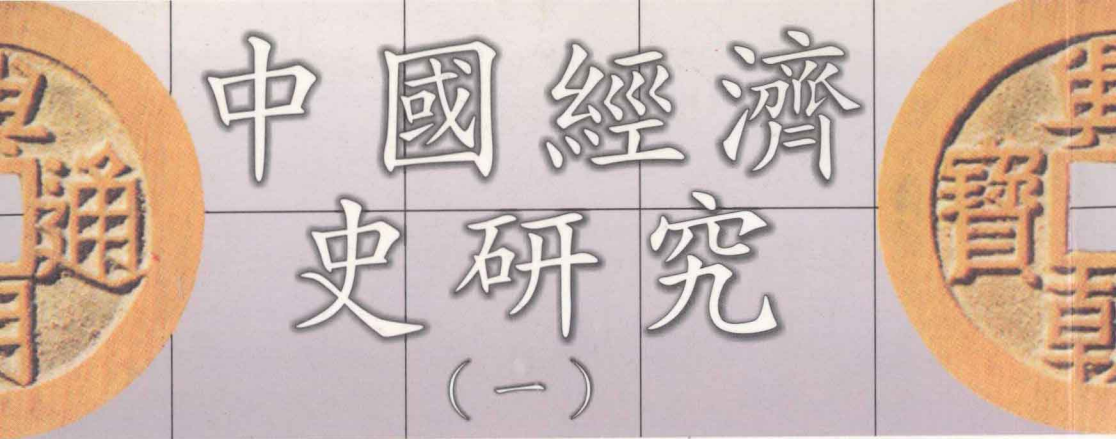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國經濟 史研究 (一)

史學叢書系列 56

全漢昇著

中國經濟史研究（一）

全漢昇◎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中國經濟史研究/ 全漢昇著. —再版. — 臺北縣
板橋市：稻鄉, 民 92

冊；21 公分

ISBN：986-7862-24-4（第 1 冊：平裝）。—

ISBN：986-7862-25-2（第 2 冊：平裝）。—

1. 經濟 — 中國 — 歷史

550.92

92013249

中國經濟史研究（一）

著 者：全漢昇

出 版：稻鄉出版社

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

電話：(02) 22566844、22514894

傳真：(02) 22564690

郵撥帳號：1204048-1

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

印 刷：吉豐印刷有限公司

定 價：新台幣 400 元

初 版：中華民國 79 年 8 月

再 版：中華民國 92 年 9 月

I S B N：986-7862-24-4

※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※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

王業鍵

全漢昇先生，廣東順德縣人，民國二十四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。隨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潛心于中國經濟史之研究。民國三十八年以後，並先後任教于臺灣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及新亞研究所，講授中國經濟史。民國七十三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。全先生治學，務實求真。半世紀來專題著述甚多，上自魏晉以迄戰前，綿延壯闊，根基深厚。他的學術見解與成就，舉世重視。本文擬將他在中國經濟史上的重要貢獻作一簡略介紹，掛一漏萬，在所難免。讀者如果希望作進一步瞭解，請參考文後所附全先生著作目錄。

一、唐宋帝國與運河

在中國經濟史上，全先生對於唐宋時期的研究，貢獻最著。《唐宋帝國與運河》一書，尤為千古不刊之作。在這本書裡，他把運河的重要性，即運河的暢通與否和唐宋國運盛衰的關係，根據史實作生動的敘述與有條不紊的因果分析。這一創作的學術價值，不僅在唐宋史

研究上極為重要，即對於瞭解近代以前中國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的發展，亦有莫大貢獻。中國自商周以至秦漢，政治、經濟和文化的重心都在北方的黃河流域，南方廣大地區多未開發。但是，從魏晉到隋唐的幾百年間，中國經濟南北二大區域的相對生產力發生空前變動。漢末至南北朝時期，北方由于戰亂頻仍，胡人入侵，生產大受破壞，漢人大規模南移。結果，北方經濟衰退，南方不斷開發。當中國再度統一（即隋唐時代），南方的長江流域，無論農、工、商、礦各業，都駕凌北方之上。南方于是取代北方，一躍而為全國經濟重心所在。

他方面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在近代輪船兵艦發展以前，海洋實為天然屏障。中國邊患，因此都在北方。歷代都必須在北方沿邊佈重兵，以防亞洲內陸游牧民族入侵。同時，為了便於瞭解邊情，控制邊郡守軍，以收指臂之效，中央政府也仍有設於北方之必要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如何維持邊境龐大駐軍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員的生活，便成爲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。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唯有把南方剩餘的糧食和其他物資大量北運。然而，中國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東，沿海交通在輪船發展以前又多危險（風暴及海盜）而不可恃，於是有建設一條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之必要。隋煬帝之開鑿運河，主要原因在此。這條運河把北方軍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經濟重心聯繫起來，對於盛唐武功有無比貢獻。以後這條運河能否暢通，也和唐宋帝國國運息息相關。

唐初行府兵制，兵農合一，且中央政府機構還算簡單，國都所在地的關中，糧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懸殊。可是到了七世紀後半的高宗時代，朝廷機構大為擴張，長安人口膨脹，同時府兵制又漸變為募兵制，軍需民食大增，關中糧食供應便大成問題。原來隋煬帝修運河，自洛陽以達長江下游。從洛陽到長安一段，有三門險灘，尚未顧及。所以，唐初南方物資，可藉運河暢運洛陽，卻難以大量輸送至長安。高宗於是設洛陽為東都，此後直到玄宗（七一三至七五五年）前期，天子及從臣常於春夏間東幸，甚或常駐洛陽，時人稱玄宗為「逐糧天子」。玄宗後期，由於名臣裴耀卿和韋堅相繼改善河道運輸——改直運為分段運輸、修陸路繞三門險灘、關中另開運河以達長安——成效大著。江淮米糧及其他物質，可源源運至關中。最盛時年達四百萬石。玄宗非但無須就食東都，而且可傾力向西北發展，大唐帝國聲威遠播，使開元、天寶年間成為中國政治史上的黃金時代。

安史之亂（七五五至七六三年）後，藩鎮割據局面形成，運河的濬修與維護大不如前，運河的交通又不時被地方兵將阻斷，大大地失去了聯繫南方經濟重心和北方政治軍事重心的作用，唐朝國勢于是中衰。吐蕃、回紇相繼侵凌。到末年各藩鎮自擅兵賦，互相爭奪，運河水道破壞，長安供應被切斷，政府財政破產，李氏王朝便再也不能維持下去。五代期間（九〇六至九六〇年），沒有一個帝王能控制運河沿線地區，他們的政權也無法長久維持。

北宋建都開封（汴州），在黃河平原上，與遼及西夏對峙。就地理形勢來說，無險可

守。一旦有患，實防不勝防。然而，和長安或洛陽比較起來，開封有一大優點：即長久以來它已成為運河南北交通樞紐，容易獲得江淮物資的充分供應。尤其北宋行中央集權，首都擁重兵，對於糧食的需要更比唐代為鉅。開封的這個優點，對於宋太祖選擇國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當時從南方運到這裡的糧食，每年多達六百萬石，甚至高達八百萬石。此外尚有其他貨物，源源到達，支持北方軍糈民食。北宋之能長久和北邊及西北二大異族抗衡，運河一脈暢通，聯繫南北，貢獻莫大。到了徽宗時候，蔡京用事，政府用于購買糧食的巨額準備金消失，又改分段轉運法為直運法，結果北運米糧大減。欽宗時，汴京被金入圍攻，運河上游又被盜賊破壞而潰決，河水淺阻，漕運不通，北宋軍事上難以支持，終於崩潰。

此後宋室南遷，定都臨安（杭州）。宋金二國以淮河為界，對立了一個世紀，以後分別為新興的蒙古所滅。據全先生觀察，宋金對峙，運河南北二段分屬二個不同的政權，而且北段完全淤塞，失去了溝通南北經濟大動脈的作用，使宋金二國國力變得分散而薄弱。另一方面，杭州居運河南段終點，和長江南岸的鎮江相連。長江諸路財賦，可以經由鎮江入運河而達杭州，源源供應。南宋所以能偏安一隅，達一個半世紀之久，運河的經濟功能仍然是個重要因素。

全先生在唐宋經濟史上另一重大貢獻，是他對於商業發展與都市化的研究。首先，為探討交通運輸對都市發展的可能影響，他選擇這個時期運河沿岸三個重要城市——揚州、開封

（汴梁）、杭州（臨安）——作深入觀察。其中開封及杭州分別爲北宋與南宋首都，由于政治及軍事上的重要功能，加上運河交通便利，使他們很快地成爲龐大的商業城市。這二個大都市有個共通的特點，即首都所在，有大量人口（官員、軍人、學生、地主、游客……）能將首都以外的財力轉移到這裡，以供消費。因此，它們的購買力很大，能夠吸引全國各地甚至國外的貨物到這裡來銷售。例如，開封所需糧食及工業品（絲織品、漆器、書籍、紙、筆、硯等），大都從東南的皖、蘇、浙、閩、贛等地輸入。藥材和一部分絲織品，取給于四川。此外，木材取給于山西、陝西；鹽來自山東、山西；鐵器及陶器分別從河北、陝西輸入；奢侈品如象牙、珍珠、香藥之類來自海外；戰馬自西夏、于闐而來。這種消費性城市的擴張，促進國內商業的發展；交通運輸的便利，又加速都市的膨脹（註一）。

揚州的興起，在經濟史上更具重要性。唐宋以前，中國都市大都由于行政或軍事功能而形成。從這個觀點來看，開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榮，仍不脫離傳統，不過規模遠較前代爲大而已。揚州在唐代的繁榮及以後取代揚州而興起的真州，卻純由其商業功能的發揮所致。在〈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〉一文中，全先生闡述這個城市在唐代繁興的最重要原因，是由於它「位于長江和運河的交叉點上，爲南北交通要衝，實是全國貨物最理想的集散地。」不但南方鹽、茶、藥材各貨，即海外舶來品，也多集中于此，再經運河北運銷售。商業發達，工業、運輸業、金融業等亦相應而生。除商業大都會的興起外，他也發現宋代若

干地方，或由于交通方便，便于商品集散，或由于人口增加，由虛市演變為市鎮（見《南方虛市》一文）。商業功能城鎮的出現與增加，象徵著都市發展的新階段。全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，無疑地起了帶領作用。

其次，唐宋時代經濟和以往不同的另一方面，是國際貿易方向的轉變。中國在唐宋以前的國際貿易，多沿「絲綢之路」與中亞各國交易。唐宋以還，由于南方的開發，航海技術的改進，及阿剌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躍，中外貿易大都轉移到東南沿海。唐宋時期，中國沿海國際貿易商埠相繼勃興。廣州、泉州、明州（寧波），可說是其中最重要的幾個。在唐代和北宋，廣州更居首位。全先生在《宋代廣州的國內外貿易》一文中，對於瞭解當時國際貿易的性質和廣州在國內外貿易所扮演角色，作了一番切實的考察。根據他的研究，宋代廣州輸入品多為珍珠、象牙、犀角、香藥等奢侈品。這些貨品大多來自南洋。輸出品則多為工業製造品，如五金、布帛、瓷器、漆器。此外，銅錢輸出很多，廣泛流布海外，遍及日本、南洋、印度、非州東岸，幾成為國際貨幣。

宋代國際貿易的經營，阿剌伯商人最為活躍。但是，華商和中國官吏經營南洋貿易者也很多。無論外商或華商，他們也從事廣州與國內各地間的貿易。例如，將進口外貨及兩廣多餘的米鹽，運銷各處。當時廣州與國內交通路線，大致有二條：一條沿著現今粵漢鐵路或附近北上，通長江西至四川，或經運河以達華北。另一條則由海道至福建、浙江、江蘇、山東

等沿海城市。廣州的繁榮是建立在轉運貿易之上。這也是由于發揮商業功能而興盛起來的城市（全先生在唐宋經濟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貢獻，將併入下節論述）。

二、貨幣經濟

中國經濟自先秦至兩漢，金屬貨幣的使用有逐漸推廣的趨勢。但是漢末及魏晉南北朝期間，貨幣發展開倒車，實物貨幣盛行，自然經濟居支配地位。唐宋時代，金屬貨幣再度流行，而且進入紙幣階段，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，比歐洲最先使用紙幣的國家——瑞典——還要早六個世紀。然而，自南宋末期經元代以至明初，由於政府對紙幣管理不善，發行漫無限制，自壞幣信；明清兩代又回復到金屬貨幣階段。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的法幣改革，中國才完全廢棄金屬貨幣，採用紙幣為通貨。從早年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史到現在，全先生一直對於貨幣與物價變動很感興趣，他在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，他人實難企及。

民國三十年底，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發表一篇長文《中古自然經濟》。這篇論文，到現在仍然是研究魏晉以至唐朝中葉中國貨幣演變的最重要著作。如前所述，魏晉南北朝時期，自然經濟居支配地位。在這篇論文中，他提出了三個問題，並從多方面考察，以求解答。第一，自然經濟何以在這個時期產生？他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戰爭。從

漢末到隋初，前後有黃巾之亂、董卓之亂、八王之亂、五胡亂華、侯景之亂等，結果人口銳減，土地荒蕪，交通困難。尤以北方爲甚，在在嚴重影響商業的衰落。其次一個重要原因，是主要幣材——銅——的缺乏。這又由於當時銅產大減及佛寺廣鑄銅像所致。銅的供給萎縮，鑄幣隨之急劇減少。錢幣缺乏，實物貨幣便自然而然地出而取代。第二、實物貨幣的使用，普遍到何種程度？他從交易、租稅、地租、及工資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，都發現以實物（絹、帛、穀）爲支付手段者多。第三，這種現象持續到何時才改觀？據他觀察，一直到唐朝中葉安史之亂前後，一方面由於商業的發展，一方面由於鑄錢的增加，金屬貨幣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。唐德宗建中元年（七八〇）的稅制改革，將以征收實物爲主的租調制度改爲以征收錢幣爲主的兩稅法，便是這種演變的明顯標誌。

他的〈中古自然經濟〉的見解，在學術界並非沒有異議。何茲全便以爲這個時期南北二個區域情形迥異。北方因受戰亂破壞，逆退到自然經濟的境地。南方經濟由於大量移民的遷入，反而逐漸開發與繁榮，貨幣經濟乃居主導地位（註二）。彭信威認爲：「這一個時代，大體上可以說是錢帛本位的時代，錢爲主，帛爲副。」（註三）這個時期，政治上四分五裂，戰亂疊起，朝代更迭頻仍，使用實物貨幣的普及程度，自然因時因地而異。但是，無論南北，這個時期錢幣缺少和紊亂，是明顯現象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實物貨幣便相應出現。考察最近有關於此一時期的一些著作，自然經濟居優勢之說，仍多爲史家所接受（註四）。

中國貨幣的發展，宋代已進入信用貨幣階段，到元朝紙幣更成爲唯一通貨。然而，宋元時代實施紙幣，最後都歸失敗。檢討中國過去實行紙幣失敗的經驗，全先生寫了二篇重要論文——〈宋末通貨膨脹及其對物價的影響〉及〈元代的紙幣〉。據他研究結果，不論南宋或元代，紙幣的發行與流通過程，大致都經過了價值穩定、溫和通貨膨脹、及惡性通貨膨脹三個階段；而且紙幣值穩定與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轍。

兩代初期發行紙幣幣信之所以良好，主要由於發行數額有限，且有充分現金準備。但是這種謹慎的發行政策，都因對外作戰而無法維持。南宋在十三世紀初屢與金人交戰，金亡後又屢與蒙古爲敵。軍事支出龐大，稅收不足，只好以通貨膨脹手段來應付。元世祖統一中國後，仍不斷征伐海外如日本、占城、爪哇等地，耗費至鉅，後來更加上諸王賞賜及佛事費用激增，財政匱乏，於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後塵，以通貨膨脹政策彌補財政赤字。到了末期，宋受蒙古進逼，領土日蹙。元末各地群雄並起，加以天災頻仍，收入銳減，紙幣現金準備完全耗盡，發行額則急劇增加。結果，幣值狂落，信用掃地，兩代政權都在惡性通貨膨脹狂潮中覆亡。經過這二次慘痛教訓，中國幣制在明清兩代又退回到金屬本位。

明代中葉以後及清代約四個世紀期間，中國幣制可說是銀銅複本位，即銀兩和銅錢兼充市場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。銀銅複本位的實施，必須以這二種金屬的充份供應爲前提。全先生對於明清兩代貨幣之研究，就是著重探討貨幣供給，以明瞭幣制之發展。在這方面沒

有人做得比他多，也沒有人的成就比他大。為探究白銀和銅的來源，他接連發表了下面十二篇論文——〈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〉、〈明季中國與菲律賓的貿易〉、〈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〉、〈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〉、〈明代中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〉、〈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〉、〈明清時代雲南的銀課與銀產額〉、及〈清代雲南的銅礦工業〉、〈再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〉、〈明中葉後中國黃金的輸出貿易〉、“Trade between China,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s during the 16~18th Centuries.”、“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—Ch’ing Period”。這些著述大大地增進了我們對於明清幣制形成的認識。

據全先生多年研究結果，明清時代銀銅複本位之所以能相當順利地運行，是由於銀和銅這二種幣材的供給大為增加的緣故。先就銀的供給來說，國內銀礦產額對於貨幣用銀的增加，自有貢獻。其中最主要的銀礦是雲南銀礦，從明代中葉到清代中葉，每年產量可能在三十餘萬至四十餘萬兩。但是，當時銀的主要來源是國外，而不是國內；美洲和日本的銀產，尤為重要。自從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西方人發現新大陸和到東方的新航路後，歐洲海上強權紛紛在美洲和亞洲掠奪殖民地。西班牙人首著先鞭，於十六世紀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、祕魯（Peru）、和玻利維亞（Bolivia）一帶，又於一五六五年自墨西哥出發，佔領了

菲律賓，而成爲一個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國。他方面，從十三、四世紀開始，已有中國商船往來南洋各地，並有不少華人聚居菲島。西班牙人佔據菲島後，中菲貿易大量展開。中國與美洲間的貿易也通過菲律賓而迅速發展起來。當時菲島生產落後，在那裡統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（如糧食）以至軍需品，都要靠華僑商人供應。中國絲貨更爲菲島及美洲西人所喜好。中國商品（特別是絲貨）於是大量往菲島輸出，大部分絲貨更以大帆船從菲島輸往美洲。爲購買中國貨物，西班牙人找不到適合的貨品來交換。但是他們有一項產品，中國人都樂於收受，那便是西屬美洲出產的豐富白銀。這樣一來，隨著中菲貿易的進展，每年都有大批白銀從美洲經菲島輸入中國。據全先生觀察，初時每年僅數十萬銀元，十六世紀末葉超越百萬元，十七世紀增至二百萬元以上，十八世紀每年更高達三、四百萬元，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減至一百五十餘萬元。他估計從一五七一至一八二一年的二個半世紀期間，約有二萬萬銀元自美洲經菲律賓流入中國。

其次，與西班牙人爭雄海上的葡萄牙人於一五五七年佔領澳門。葡人以澳門爲據點，也積極開展對外貿易。她們向中國大量收購絲貨、棉布、瓷器……等，分別往三個地方輸出，以謀鉅利。第一，往西運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據地果亞（Goa），一部分更轉運至歐洲。第二，往北運至日本長崎。明末倭寇爲患，中國政府禁止日本通商，葡人趁此充中日貿易媒介，以滿足日人對中國貨物的需求。第三，也往南運至菲律賓。結果，大量白銀也不斷地由

這三個方向流入中國。十六、七世紀之交，日本爲世界上僅次於美洲的盛產白銀之地。據估計葡萄牙當時運往長崎的中國貨物，每年約值一百萬兩以上，稍後有時甚至高達二、三百萬兩。

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早期，英、美、法、荷諸國也載運大量白銀到中國，以購買絲、茶等產品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輸華白銀數量更居魁首。十八世紀後半，廣州一地每年輸入白銀達四、五百萬銀元之多。據摩爾斯（H.B. Morse）估計，由一七〇〇至一八三〇年期間，廣州一地淨輸入白銀約共四萬萬銀元；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輸入，總數當在五萬萬銀元左右。

現在再看銅的供給情形。明代銅產不盛，鑄錢遠較前代爲少（元朝除外）。十五世紀紙幣停止流通後，用銀多於銅錢。有清一代，不但白銀日多，銅錢流通數亦大爲擴張。清初鑄錢用銅，多從日本進口，稱爲洋銅。從十八世紀早期開始，清政府積極發展國內銅礦，雲南銅礦產量扶搖直上。雍正朝（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）前期，每年產量一百萬斤增至四百萬斤。從乾隆五年（一七四〇）到嘉慶十六年（一八一—），年產大多維持在一千萬斤以上。銅產豐富，足以滿足全國鑄錢的需要。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早期，銅錢流通額持續大量增加，與白銀流通額並駕齊驅。銀銅複本位制，可說已發展至成熟境地。

三、物價史研究

關於中國物價史的研究，全先生更屬開路先鋒（註五）。研究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物價，非常困難。首先是材料缺乏，無論是官書、地方志、或私人著述，記錄零碎而又多不明確。原始材料如商店帳簿、土地買賣契券、收租簿、官方報告等，保存無多（註六）。其次，中國過去幣制和度量衡不統一，斗的大小、秤的輕重、尺的長短、地畝的寬狹，因地因時而異。銀兩和銅錢的成色及重量，也各地互異，且有公鑄私鑄之別。因此，即使千辛萬苦收集到一些物價材料，仍然難以作時間上或地區間的比較。在重重困難之下，全先生多年來日以繼夜地搜求整理，做出了可觀的成績。今天我們對於民國以前約一千三百年間的物價變動，有一個粗略的了解，不能不歸功於他。

滿清入關以前的物價變動趨勢，除前述二篇有關宋、元紙幣通貨膨脹的著述以外，他還著有〈唐代物價的變動〉、〈北宋物價的變動〉、〈南宋初年的物價大變動〉、〈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〉、及〈明代北邊米糧價格的變動〉等論文。現在將他研究唐、宋物價的成果簡述於下：關於唐代約三個世紀期間，他發現曾經發生三個物價下落時期和四個物價上漲時期：（一）開國後十年（六一八至六二七年）因承隋代幾度對外征伐之後，加以農

產失收，物價昂貴。(二)從貞觀初期到高宗前半期（六二九至六六六年）約共三十八年間，政府鼓勵生產，改善錢幣，田禾豐稔，百物低廉，是政治史上有名的貞觀永徽之治。(三)高宗後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半世紀期間，錢幣貶值，水旱間發，物價有騰漲之勢，不過上漲程度並不厲害。(四)開元、天寶時期（七一三至七五五年），社會經濟繁榮，百物豐盈，物價廉賤，是歷史上難得的昇平盛世。(五)公元七五五年安祿山叛亂，結束了這個千古歌頌的黃金時代。此後三十年間，因受戰爭破壞，凶荒疊見，以致物價空前飛漲。(六)從德宗貞元年間到宣宗大中年間（七八五至八五九年）的七十餘年，物價有長期下降之勢。這是由於政府實施兩稅法，人民必須以錢納稅；同時，商業發達，對於錢的需求亦增。他方面，銅產不足，佛寺及工業用銅又大量增加，市場上錢的供給不能適應需求，演變為錢重物輕的現象。(七)唐代的最後四、五十年（八六〇至九〇七年），戰亂連年，災荒頻仍，物品供應非常缺乏，物價於是又扶搖直上。

同樣地，全先生也把北宋物價變動鉤劃出一個輪廓。他將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價變動劃分為四個時期：第一個時期（九六〇至一〇二二年），物價長期下落，主要是由於農產增加和貨幣緊縮二個因素所造成。第二個時期（一〇二三至一〇六七年），因受西夏戰爭影響，耗費甚鉅，財政收支失去均衡，物價上漲。第三個時期（一〇六八至一一〇〇年），物價趨向低落。他認為當時物價下降的主要原因，是王安石實行募役、青苗等新法，對於貨幣